

海斯特·白兰的救赎之路

姚秀娟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在《红字》中,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清教道德,对海斯特·白兰进行了“他者”排斥。然而,海斯特·白兰并没有完全成为患有“失语症”的弱势女性,通过对罪恶的内省和对迪梅斯戴尔的抚慰,白兰表现出了隐忍、勇敢和坚韧等精神。在这个过程中,海斯特·白兰逐渐成为一名具有人性光辉的救赎圣女。

关键词:道德救赎;《红字》;海斯特·白兰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13)04-0125-04

文学之魅力何在?笔者认同文学当中蕴含着人学之深刻理论。而对于人性的考量向来是古今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在扎根于清教传统的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作者纳桑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将这个话放置在一位离经叛道的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Hester Prynne)和清教卫道士之间的矛盾上面。小说开篇,这种冲突已经达到了一种白热化状态。女主人公站在审判台上受到谩骂、威胁与唾弃,并被判定为一名道德沦丧的罪人。霍桑描写这样一位女性在当时当下是具有极大的叛逆性的。虽然,一些诱惑女性堕落的小说如《卖弄风情的女人》曾在图书市场上取得成功,可是这样的女性形象被认为是不耻的。而《红字》女主人公叛逆的性格更是与同时代作品中对女性道德的要求大为不符。当时,处于民主建设的美国正在寻求本国特色,美国公民在体力和智力上需要对民主建设添砖加瓦,女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被定位为是贤妻良母型。例如,凯瑟琳·比慈(Catherine Beecher)在《家庭经济条约》(*A Treatise on Domestic Economy*)中对女性的责任作出这样的阐述。比慈认为,女性的活动区域应该在家庭范围当中,女性的贡献体现在相夫教子上面^[1]。女性在这种道德环境中的形象是内向化的,即家庭责任是评判一位女性道德的重要指标。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霍桑对海斯特·白兰的创作情感似乎若近若离。白兰之罪虽然在开篇引起哗

声一片,但是小说主要表现了白兰如何救赎的过程。批评家多数围绕白兰对自身罪恶的认知和解析,这种批评方法聚焦于白兰内心的挣扎,揭示了霍桑对白兰的褒贬态度。沿着白兰认知自我罪行这条思路发展下去,事实上,白兰的救赎是对清教权力话语挑战的过程。这里似乎存在一种假象,因为,按照一般清教法律,犯下通奸罪的女性会遭受鞭笞之苦,佩戴红字对白兰的惩罚似乎是出于清教徒对罪人的怜惜。可事实上,白兰在没有充分表述罪之缘起的重压下,已经变成了一位患有失语症的“他者”。幸好,白兰没有被清教法规窒息而亡,而是通过遵循内心对于真善美的理解,最终获得了救赎。

一 人性解放之于浪漫主义时期

在《红字》之前的作品中,霍桑的创作常常呈现出一种黑色阴郁的风格。发表于1835年的短篇小说《好小伙布朗》(*Young Goodman Brown*),讲述年轻人布朗在月黑风高之夜目睹群魔乱舞之后,内心极度恐惧,对清教徒伪善的面孔极度厌恶,最终忧郁而亡的故事。在1836年发表的另一篇短篇小说《教长的黑面纱》(*The Minister's Black Veil*)中,霍桑将胡普(Hooper)先生罪恶的内心用面纱掩盖起来,使其一生无法挣脱罪恶灵魂的缠绕。在对霍桑作品的解读当中,批评家们常将霍桑揭示人物内心阴暗定位到美国浪漫主义精神当中。这一阐释展现的是在浪漫主义思潮中,霍桑所作的伦理思考。只

收稿日期:2012-10-19

作者简介:姚秀娟(1984—),女,山西大同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美国文学与文化方面的研究。

是在《红字》当中,这种浪漫主义精神不再阴郁,而是透射出积极向上的力量。白兰勇于面对罪恶和追逐真挚爱情,体现了霍桑在浪漫主义时期对于人性解放的不断推崇。

在浪漫主义时期,个人被提升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解放自我意识,认识人类内心更是被极力倡导。美国超验主义者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大声疾呼:要相信自己,相信在你的内心真实的东西,在别人身上也是如此^[2]。而爱默生对个人精神的颂扬也影响到了正在苦苦寻求作家梦想的霍桑。拉里·J·雷诺德(Larry J. Reynolds)发现,当霍桑在1842年移居到康克德镇居住的时候,他进入了爱默生的超验世界。并且在其中得到“灵感和挑战”^[3]。在1835年发表的《欢乐山中的五月柱》(May-Pole of Merry Mount)中,霍桑的作品当中蕴含着爱默生式的自我依靠和批判传统的精神。虽然两位追究爱情的无辜恋人被残酷的新教教徒无情屠杀,可是他们却在五月柱上完成了神圣的婚誓。对于人性的讴歌在霍桑描写海丝特·白兰的时候得以更大程度的发挥。小说当中,女主人公同样也是受到清教法规的责难。不过,女主人公敢于拒绝清教赎罪方式。

二 清教伦理之解析

清教救赎缘起何处?对于这个问题的解析,需要定位到《红字》提及的历史文化当中。布莱恩·哈金(Brian Harding)发现,真实历史人物清教法官文斯莱普(Winthrop)出现在脚手架审判一幕。由此可以推断,霍桑故事发生的大概时间背景是在1642年,当时,大量移民涌入马萨诸塞州将近有十几年^[4]。查拉卜·H·斯诺(Chaleb H. Snow)发现,在当时移民人群中,来自英国的清教徒占多数^[5]。当时的清教徒同其他基督教一样,相信原罪说。为了洗清罪恶,他们不断同上帝对话。这种对话来自于对世俗欲望的节制和对自我内心的省察。然而,对于这种救赎方式,在殖民地有着不同的认知和解读。在1638年,安·哈德森(Anna Hutchinson)因为认为救赎在自我内心的认识而不是对上帝之约的遵守,被驱逐出清教社区。霍桑在《红字》中提到这位女性,并且读者发现,这位哈德森与《红字》女主人公白兰对信仰有着相同的认知。不同的是,哈德森没有犯下白兰之罪。在夏娃偷食禁果犯下原罪以后,女性在很长时间被判定是导致人类堕落的罪人。如果原罪是《圣经》上有着神谕一样的作用,白兰则将这种罪恶在现实中重演了一遍。不过,《圣经》当中,耶稣基督通

过牺牲自我救赎了人类之罪,在《红字》中的白兰这位信徒也具有“替罪羊”形象。然而,不同于救世主耶稣,白兰则是一位被视为绝对的攻击对象和罪恶诱因者。耶稣的牺牲出于博爱仁慈之心,白兰却被涂上黑色阴影。如何祛除这些影子?佩戴红字这种惩罚方式对白兰认知罪恶有何效果?

事实上,清教徒惩罚的目的旨在感化罪恶的“灵魂”。从清教审判白兰来看,并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更不用说佩戴红字了。当时,审判者不断要求白兰说出另一个罪人姓名甚名谁。这里存在着一个两难命题:如果白兰说出罪人的名字,那么白兰将会违清教反忠贞的教义;如果白兰不说出或乱说罪人的名字,那么白兰将会违反清教诚实的品质。清教徒对白兰的冷漠,使女主人公更加倾向对爱情的坚守。作为一个相反的例证,牧师亚瑟·丁梅斯代尔(Arthur Dimmesdale)这位牧师没有勇气揭发自己的罪行,因为惧怕清教惩罚而背负着心灵上的折磨。清教伦理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压抑人性的法则。七年来,他一直为掩藏这个秘密而不断自毁,最终红字刻入他的内心深处。霍桑如下描写这位牧师的内心:我的红字在悄悄燃烧,……所有的事情都是谬误!空虚!以及彻头彻尾的死亡^[6]。

不仅仅是这位牧师,其他村民也成为教条压制的牺牲品。霍桑在描写村民的时候用“灰色”来表现出他们模棱两可的道德态度,他们已经丧失了一个人起码的是非判断。由于着眼于表层现象,白兰的罪行在他们看来只是放纵欲望的结果,小说中真正罪恶之人在人群当中,他就是白兰来到新大陆之前的丈夫罗杰·齐灵渥斯(Roger Chillingworth)。格罗瑞亚·查森·厄尔里奇(Gloria Chasson Erlich)认为:他(齐灵渥斯)旨在诱捕和摧毁牧师丁梅斯代尔,而且如魔鬼般地试图阻止最后净化心灵之忏悔,以便使其不能够释出牺牲者所拥有的力量^[7]。齐灵渥斯控制了可怜的牧师,这表明他成功地支配民众惩戒法则。在人们已经被石化或是堕落的情况之下,海丝特·白兰如何救赎?她勇敢的坚守隐忍、耐力和忠贞的美德,最终成为救赎圣女。

三 海丝特·白兰的伦理救赎

《红字》同霍桑其他的小说一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象征。其中最重要的象征是白兰身上所佩戴的红字A。这个简单的字母A由“通奸罪”(Adultery)最后变成“天使”(Angle),似乎证明白兰已经获得救赎。但是,对于红字象征的解读似乎还包含白兰对于大众意识形态的融合。随之产生的结果便是白

兰之妥协和权威之操控,这样的解读会淹没霍桑对清教思想的批判性。而如果将白兰对清教道德的对抗性作为出发点,则可以揭示出霍桑独特的伦理观念。

小说一开始是这样表现两者冲突的:白兰佩戴代表“通奸罪”的红字 A 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霍桑对白兰胸前的红字进行了特写:用金丝线绝妙地绣着花边的鲜红的字母 A^[8]。原本是耻辱的象征,但是此刻,这个字母却在众人的流言蜚语中发出熠熠光彩。受到清教徒家庭道德以及对于异己的排斥,公众认为白兰罪无可赦。霍桑通过展现公众话语来展现他们对于白兰的态度。有的人认为,应该在海丝特·白兰的额头上用烙铁打下印记^[9]。更有甚者认为,这个女人给我们所有的人都带来了耻辱,简直应该去死^[10]。霍桑在描述这些话语的时候,白兰几乎处于无声状态。即白兰和公众相比较,两者在话语权方面有很大的悬殊。这种不平衡展现了小说当中的内在矛盾,即个人追求和道德标准之间的矛盾。白兰在这场冲突当中,一开始就处于劣势,然而,她却坚韧地捍卫着自己执著的信念。

白兰的信念在小说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白兰对爱情的向往至死不渝。在白兰犯下罪行之后,她曾经向丈夫齐灵渥斯坦白道:我没有感受到爱情,我也不想装假^[11]。显然,白兰成为了传统婚姻的牺牲者。霍桑在描写白兰受审之前,对监狱前的玫瑰进行了特写。玫瑰是爱情的象征,它火热的激情正如白兰的爱情一样,散发出真正芬芳。然而,在对爱情追逐的过程中,白兰的牺牲是显而易见的。在白兰受审之前,她的内心挣扎万分,霍桑这样描写她的心理:可能是真的吗?她把孩子往胸前猛地用力一抱,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她垂下眼睛注视着那鲜红的字母,甚至还用指头触摸了一下,以便使自己确信婴儿和耻辱都是实实在在的。是啊——这些便是她的现实,其余的一切全都消失了^[12]。白兰矛盾的心理由此可见一斑。如果爱情是诱发罪过的源泉,那么爱情本应该被冷漠之水淹没才是。可是白兰并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在受审的时候,她拒绝说出所爱之人的名字,并不是说白兰在包庇另外一个罪人,而是以一种隐忍的态度将罪行独自承担起来。从这时开始,白兰已经认识到自己与清教徒思想上的分歧,开始寻求自己的救赎之路。

除了对爱情坚韧的追求和对公众责难的隐忍,白兰的信念还表现在其对爱人丁梅斯代尔的心灵予以抚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兰的爱情是超乎自我的一种信念,是一种责任感的表现。这位牧师

在罪恶面前百受折磨。虽然他并没有受到公众的指责,而且还堂而皇之的进行传教。然而,外表上对于清教道德的顺从,并不能掩饰内心的折磨。当白兰与丁梅斯代尔相见的时候,他已经憔悴不堪。丁梅斯代尔当真是有一种梦幻的阴影中行走,或许实际上是在一种梦游的影响下行走^[13]。与白兰的勇于开诚布公面对罪恶相比,丁梅斯代尔受到的惩罚来自内心。但是,他却把痛苦强加在了白兰身上。霍桑将牧师怯懦的心灵用简短的话语表现了出来:我这燃烧的秘密!……这一切都是谎言!空虚!——死亡!^[14]。丁梅斯代尔每况愈下的情景并没有在清教道德规范之下得以庇护,而是成为虚伪做作的牺牲品。在这时,白兰清楚的认识到了,罪恶不应该从始至终受到鞭撻,而是应该以坚毅的态度勇于面对,自我重生。白兰对他说:你已经深深的忏悔了。你的罪恶在很久以前就离你而去了^[15]。这段话也是白兰的内心独白。在这里,霍桑表现的救赎是不断发掘人性良知的过程,而不是终身背负精神负累,不愿直面罪恶惨淡的心理。白兰经受了耻辱、绝望和孤独,这种艰辛的考验更加烘托出白兰独立果敢的个性特征,同时霍桑对清教道德以恶为恶的批判是不容置疑的。

综上所述,霍桑对人性的思考深深扎根在美国清教传统道德当中。而对于包含人性善恶的罪与救赎,霍桑的表现手法趋于清楚认知、模糊表现的状态。白兰的救赎之路体现的是个体由恶向善、内省觉悟的过程。此处,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白兰在救赎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隐忍、坚韧和勇敢等美德。由此,可以发现小说对于人性的关注是使其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 [1]Catherine Beecher. A Treatise on Domestic Economy [M].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845: 3 - 38.
- [2]Ralph Waldo Emerson. Self-Reliance [M]// Alfred R. Ferguson, Jean Ferguson Carr. The Essay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7.
- [3]Larry J Reynolds. Hawthorne's Labors in Concord. [M] // Richard H. Millingt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thaniel Hawtho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6.
- [4]Brian Harding. Introduction [M]// Brian Harding. The Scarlet Lett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ix.
- [5]Chaleb H Snow. A History of Boston [M]. Boston: Abel Bowen, 1825: 11.
- [6]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2.
- [7]Gloria Chasson Erlich. Deadly Innocence: Hawthorne's Dark

- Women [J].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1968 (2): 170.
- [8]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3.
- [9]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1.
- [10]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1.
- [11]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74.

- [12]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9.
- [13]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7.
- [14]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2.
- [15]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1.

【责任编辑 岩 宏】

(上接第 113 页)

在这里,诗人对家谱、对历史、对宗法社会进行了无情的虚构、揶揄和嘲讽。家谱本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社会中,家谱、祠堂、族长等非常重要,是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统治的重要工具。而诗人在这里却“虚构”出一份“家谱”,用一种近乎调侃的方式对自己及家族的历史进行想象:“上溯 300 年是几个男人在豪饮,上溯 3000 年是一家数口在耕种”。诗人在浩无际涯的想象中也融进了历史的沉重感和沧桑感。接着诗人又从大海的一滴水想到山东的一个小村落,从江苏的薄产想到今夜自己的台灯,进而想到了文盲、秀才、土匪、小业主……甚至想到了自己是否游荡过汉代的皇宫,想象越是不着边际,对历史、对宗法社会的批判越是深刻。在这类批判历史的诗作中,诗人不带任何政治的功利色彩,而是以一个有着独立意识的文人的角色,对历史进行重新构建和批判。

西川是中国当代诗坛尤其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非常重要的诗人,也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诗人。他在诗中表现出来的想象的无拘无束、意象和语言组合上的跳跃与奇谲、独立的文人意识、深沉的哲思、天地的情怀以及对历史和社会的责任与担

当,都成为中国诗歌领域的宝贵财富,并将随着时间的沉淀而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参考文献:

- [1] 刘士杰. 沉思中显现静穆的诗美——浅论西川早期的诗[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1): 101.
- [2] 刘士杰. 沉思中显现静穆的诗美——浅论西川早期的诗[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1): 101.
- [3] 柯雷. 非字面意义: 西川的明确诗观[J]. 张晓红, 译. 诗探索, 2003(3): 311.
- [4] 柯雷. 非字面意义: 西川的明确诗观[J]. 张晓红, 译. 诗探索, 2003(4): 314.
- [5] 刘纳. 西川诗存在的意义[J]. 诗探索, 1994(2): 78.
- [6] 黄明, 吴晓川. 飞越心灵的高地——解读西川《鹰的话语》中的意象世界[J]. 宜宾学院学报, 2011(5): 84.
- [7] 柯雷. 非字面意义: 西川的明确诗观[J]. 张晓红, 译. 诗探索, 2003(4): 315.
- [8] 柯雷. 西川的《致敬》: 社会变革之中的中国先锋诗歌[J]. 穆青, 译. 诗探索, 2001(1-2): 346.
- [9] 柯雷. 西川的《致敬》: 社会变革之中的中国先锋诗歌[J]. 穆青, 译. 诗探索, 2001(1-2): 349.
- [10] 程光炜. 西川论[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5): 1.

【责任编辑 王 涛】